



企业合规专业委员会 法律资讯

主编：谢佩之

副主编：王黎君、胡晓光

责任编辑：王英卜

2024 年 6 月

目 录

互联网游戏公司刑事风险及合规建议	1
控股股东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视角下的董监高责任及合规路径	9
聚焦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犯罪（一）——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	18
让“吹哨人”敢于吹哨：关于内部举报人保护机制的思考	26

作者：尹庆¹、陈千智、施子涵

¹ 上海律协企业合规专业委员会委员、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天同反舞弊业务负责人。尹庆律师曾在某直辖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工作，参与侦办多起央督、市督等具有重大影响的金融、证券及职务类经济犯罪案件。之后分别在全球知名药企及多家大型金融机构任职，负责公司内部合规体系建设、反舞弊、反腐败调查、危机管理等事务。尹律师作为最早专门从事合规业务的律师，长期专注于反舞弊和商业贿赂、企业合规领域，为多家国内外著名企业提供了包括合规体系建设、公司内部调查、政府调查应对、危机管理及预防等法律服务。尹律师现为上海自贸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入库专业人员。尹庆律师目前执业领域为反舞弊、反商业贿赂、公司内部调查及政府调查应对等法律服务，并且在反洗钱、白领犯罪、公司治理、单位犯罪预防领域有深入研究。尹庆律师是国际注册舞弊审查师（CFE）、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国际认证反洗钱师（CAMS），并具有国际注册内部控制自我评估专业资格（CCSA）及 CFA-ESG 投资证书。

互联网游戏公司刑事风险及合规建议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民众娱乐需求的日益增加，互联网游戏行业蓬勃兴起。伴随而来的，则是互联网游戏公司所要面临的各种刑事合规风险也正不断增加。一些互联网游戏公司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或是为了追求高额利益，或是为了保持竞争优势，铤而走险采取违规操作，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导致互联网游戏行业中的违法犯罪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拟结合具体的罪名，探讨互联网游戏公司面临的刑事合规风险，并提供相应的合规建议，以期在互联网游戏公司的合规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互联网游戏公司；刑事风险；合规建议

目 录

一、互联网游戏公司的涉赌风险及合规建议

（一）法律规定

（二）实践中的常见场景

（三）合规建议

二、互联网游戏公司的传销活动风险及合规建议

（一）法律规定及实践案例

（二）合规建议

三、互联网游戏公司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风险及合规建议

（一）法律规定及实践案例

（二）合规建议

四、结语

一、互联网游戏公司的涉赌风险及合规建议

（一）法律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对涉赌行为的刑事责任进行了框架性规定。该条第二款对开设赌场罪进行了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虽然开设赌场罪中未规定单位犯罪，但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互联网游戏公司中实际实施开设赌场行为的人依然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针对利用网络游戏开展赌博活动的行为，《关于禁止利用网络游戏从事赌博活动的通知》《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规范网络游戏经营秩序查禁利用网络游戏赌博的通知》《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等由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先后印发的文件则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对上述各类规范中的条文进行总结，能够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互联网游戏公司不得研发、运营各类赌博游戏或变相赌博游戏。目前，互联网游戏公司一般已经不会直接运营诸如“梭哈”“赌大小”“扎金花”等赌博游戏，但是却可能因为有些游戏的玩法涉嫌变相赌博而被认定为开设赌场。下文将结合司法判例对互联网游戏公司可能被认定为变相赌博游戏的玩法模式进行分析。

（二）实践中的常见场景

1. 提供游戏币回购和套现

一些互联网游戏公司通过为玩家提供购买虚拟货币的渠道，然后使用这些虚拟币进行游戏。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关注的通知》之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兑换自身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不得用于支付、购买实物或兑换其他单位的产品和服务，更不能兑换法定货币。虽然作为游戏运营方的游戏公司并未给玩家提供将虚拟货币可以兑换为法定货币的渠道，但如果主动与币商开展合作，或是默许币商与玩家进行现金交易，则可能涉嫌构成开设赌场罪。

一是互联网游戏公司主动与币商开展合作，提供游戏币回购和套现。例如，在“骆雄杰、张虎等开设赌场案”中，杭州凡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涉案人员采用“游戏公司+外部代理”形式运营“巅峰捕鱼”游戏，蓄意绕开监管规定，表面上游戏公司只接受充值发行虚拟货币，暗地则借助外部代理向玩家提供兑现法定货币的服务，其实质是形成一个完整的“上分+随机

事件+下分”的赌博闭环结构，本质上依然属于开设赌场。本案系上海市首例以“游戏公司+外部代理”为形式的开设赌场案，一审、二审均认定游戏公司涉案人员构成开设赌场罪。[1]

二是默许币商提供游戏币回购和套现，实践中亦有案例。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深圳市东方博雅科技有限公司在运营“德州扑克”游戏的过程中，因与企合作的游戏币代理商存在套现行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及相关人员也因未对币商的套现行为进行监管和制止而涉案。据报道，该案经过一审[2]、二审又发回重审，案件目前审理过程中。

2. 组织电子竞技比赛并另设支付结算通道

随着互联网游戏行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戏公司开始组织各种电子竞技比赛。电子竞技本身是一种体育运动，但其比赛结果一旦与财物的输赢相挂钩，则具备了赌博的特征。

例如，在“李思威开设赌场案”中，涉案人员所经营的海南赛季电子竞技有限公司开发上线了一款名为“掌趣电竞”的网游APP，该APP可在线组队，组织玩家购买门票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手游比赛。APP从门票中“抽头”，并设置提现功能。比赛结束后，玩家可根据排名从APP内提现。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人员以电子竞技为载体，利用APP设置规则、提供平台，控制管理聚赌的人员；另设独立的支付结算平台，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抽头渔利。虽有别于传统开设赌场，但其实质是融合了传统赌场特征和热门电竞赛事的新型犯罪手法，依法应予刑事处罚。[3]

3. 向赢家收取额外服务费用

许多互联网游戏公司所开发运营的棋牌类游戏，在对局开始前，会向玩家收取一定数额的固定台费。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少量的游戏服务费、入场费可以被解释为合理的服务费。但是，如果游戏公司在对局结束后还要从获胜玩家赢得的游戏币中扣除一定比例的游戏币，则这一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抽水”。

例如，在“杨小珑开设赌场案”中，湖南天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尚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运营“天乐红中麻将”网络棋牌游戏过程中，除了销售房卡获利外，还通过收取赢家每场对局10%“水费”的方式获利。最终，法院认定上述公司的人员构成开设赌场罪。[4]

（三）合规建议

针对上述互联网游戏公司的涉赌刑事风险，我们提出如下合规建议：

1. 关于游戏币的兑换、交易

(1) 互联网游戏公司向用户出售的游戏币只能用于兑换本公司提供的虚拟产品和服务，不得用于支付、购买实物、兑换现金或其他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虽然一些著名网络游戏目前确实提供了第三方产品兑换（即使这种行为目前处于监管默许状态），但我们也不建议效仿。

(2) 互联网游戏公司不得同时经营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也不得为用户间的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便利。

(3) 互联网游戏公司不得为用户提供虚拟货币退还服务（除非游戏终止运营）。

2. 关于电子竞技比赛的组织

(1) 互联网游戏公司在组织电子竞技比赛时，可以允许玩家在游戏内使用游戏币参与比赛，也可以设置奖励。但是，必须确保这些虚拟游戏币无法直接兑换为现金或其他具有价值的物品，奖励可以设置为虚拟道具、游戏内积分、游戏内虚拟货币或公司提供的其他虚拟产品和服务。

(2) 互联网游戏公司所组织电子竞技比赛的规则和奖励机制应当公开，并通过公司官方网站或 APP 内显著位置进行公示，以确保比赛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3. 关于服务费用的收取

互联网游戏公司在提供游戏服务的过程中，可以收取固定、合理的服务费（如果组织电子竞技比赛，亦可以收取合理的报名费），但是不能根据比赛输赢结果按比例收取佣金。

二、互联网游戏公司的传销活动风险及合规建议

（一）法律规定及实践案例

传销，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以及《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

导者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游戏行业从业人员通过网络游戏实施传销活动的情况。一般而言，他们在玩家进行用户注册时会要求玩家支付注册费用，然后按照一定的层级结构发展下线，直接或间接通过发展下线获利。这些人通过引诱参与者继续发展他人以达到骗取钱财的最终目的，涉嫌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例如，在“刘洪亮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广州某游戏公司实际负责人刘洪亮伙同公司技术员研发“魔幻农庄”游戏并上线运营，并设置如下主要规则：（1）新玩家通过关注魔幻农庄微信公众号或者点击他人推送的链接下载游戏，并支付人民币 330 元给推荐人（即上级玩家）用于获取游戏资格；（2）玩家注册并登陆游戏后系统会赠送一块普通土地，上面有一棵树和 300 朵玫瑰花，玩家通过施肥，玫瑰花数量按一定比例的速度生长，增长的玫瑰花可以用于交易，也可以用于开发新的土地；（3）魔幻农庄的游戏玩家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分花农、花仙子、花天使、庄园主。玩家一开始的等级为花农，每推荐 10 个下级玩家，便升级为 1 个花仙子。拥有 4 个花仙子后，便升级为 1 个花天使。如果玩家种满 10 块普通土地和 5 块金土地后，还直接推荐了 40 个以上的下线玩家，经审核后就能成为庄园主；（4）游戏中玫瑰花的生长方式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根据系统所设置的固定生长率进行静态增长，另一部分是动态增长（游戏玩家每直接推荐 1 个下级玩家，系统便奖励 16 颗玫瑰花种子，每 100 颗种子可转换为 90 朵玫瑰花；上级玩家每天还可以获取下一级玩家当天增加玫瑰花数量的 10%，该部分为游戏奖励，不从下级玩家的玫瑰花数量中扣除）；（5）玫瑰花可以在游戏中买卖。因游戏中没有聊天系统，游戏玩家只能在微信群里交流并采取微信或支付宝支付的方式进行交易。花农、花仙子和花天使每天出售玫瑰花的上限是 1000 朵，而庄园主每天出售玫瑰花的上限是 2000 朵。交易过程中，系统会扣除卖家 10% 的收益，但卖家是庄园主级别的除外。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人员利用网络游戏，采取各种宣传手段要求参加者以缴纳门槛费的方式加入并组成层级，并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主要获利来源，通过高额回报引诱参加者不断投资并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三）合规建议

针对上述互联网游戏公司的传销活动刑事风险，我们提出如下合规建议：第一，合理单层级推荐奖励机制。推荐奖励应当合理合法，避免形成多层级的奖励结构。互联网游戏公司可以奖励用户邀请新玩家注册或购买游戏内道具，但是奖励的层级应当严格限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出现多层级的推荐关系。例如，推荐奖励仅限于直接邀请的用户，而不涉及间接邀请的用户。第二，限制每日交易和收益。互联网游戏公司可以设置每日交易和收益上限，防

止用户通过游戏获得过高的经济收益。例如，限制用户每日只能获得一定数量的虚拟货币或只能进行一定次数的交易。第三，设置固定奖励而非比例奖励。互联网游戏公司应当确保用户单次获得的奖励是固定的，而非在后续按照其邀请之人的消费金额按比例设置奖励。例如，用户每邀请一个新玩家注册，可以获得固定数量的游戏币，而不可根据新玩家的消费金额设置递增奖励。

三、互联网游戏公司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风险及合规建议

（一）法律规定及实践案例

信息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已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受侵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规定了单位亦可以构成本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含义进行了规定。根据该解释：

首先，“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其次，“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

最后，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1）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3）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4）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5）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6）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7）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8）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9）曾因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

尽管法律已经明确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但是实践中依然存在游戏公司人员在运营网络游戏的过程中，为了推广游戏而非法获取玩家信息，进而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存在。

例如，在“叶辉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涉案游戏公司人员为推广游戏、招揽更多的玩家，与他人合作，购买玩家资料并交给客服人员，由客服人员与玩家取得联系并推荐其下载网络游戏平台，最终法院认定涉案游戏公司人员的上述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5]

（二）合规建议

针对上述互联网游戏公司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风险，我们提出如下合规建议：第一，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数据采集与使用政策。互联网游戏公司应当在游戏官方网站和 APP 内显著位置公布隐私政策，明确告知玩家其数据将如何被使用，并保障玩家的数据隐私权利。公司仅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合渠道收集必要的玩家信息，避免过度收集与游戏推广无关的数据，且应当确保在收集和使用玩家信息前，告知玩家具体用途并获得明确同意。

第二，规范数据处理和存储流程。首先，互联网游戏公司可以对有权访问玩家信息的人员范围作出限定，只有特定岗位和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玩家信息，同时与接触用户数据的员工签署保密协议，并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网络安全教育、技术培训和技能考核。其次，可以在数据传输和存储过程中使用加密技术，确保玩家信息的安全性。

第三，采取合规的游戏推广策略。互联网游戏公司应当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进行游戏推广，避免使用玩家信息进行非法推广活动。同时，在与外部第三方合作进行推广时，应当与其签署数据保护协议，确保合作方遵守与数据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四、结语

在互联网游戏行业高速发展的环境下，确保公司的合规经营至关重要。识别和防控运营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刑事风险，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游戏公司的必修课。互联网公司可以参照本文所提出的合规建议，根据业务的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合规制度和流程，加强内部管理和监

督，以有效降低公司面临的刑事合规风险。唯有确保公司合规经营，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稳步发展，为玩家创造良好的游戏环境。

注释：

- [1]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 02 刑终 222 号刑事判决书
- [2] 参见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 08 刑初 38 号刑事判决书
- [3] 参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1）沪 0107 刑初 874 号刑事判决书
- [4] 参见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2021）湘 0626 刑初 94 号刑事判决书
- [5] 参见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 06 刑终 103 号刑事判决书

控股股东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视角下的董监高责任及合规路径

摘要：近年来，在打击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抓实“关键少数”，追责“首恶”，重点关注对上市公司治理有决定性影响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实现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精准打击，已经成为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的共识。从2019年《证券法》修订到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发布，均有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责任的规定，体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券违法领域的衔接日益紧密。本文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组织、指使实施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为视角，深入探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董监高”的责任认定，明确其法律适用。在精准识别信披违法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董监高在信披违法案件中的抗辩事由，并针对董监高提出公司治理的合规路径。

关键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控股股东；董监高责任

纲目

- 一、控股股东的主体认定标准与信息披露义务
- 二、控股股东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相关主体的责任认定
 - （一）控股股东的信披违法情形
 - （二）控股股东的信披违法责任
 - （三）董监高的信披违法责任
- 三、董监高在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的减责或免责事由
 - （一）不存在直接参与或知悉违法行为的情形
 - （二）发现舞弊问题后辞职或向监管机构报告
 - （三）在年度报告中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 （四）积极采取措施纠正错误行为
- 四、董监高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合规路径
- 五、结语

一、控股股东的主体认定标准与信息披露义务

我国上市公司呈现出以绝对控股模式和相对控股模式占主导的股权结构特征，在这两种股权控制模式下，都必然会形成控股股东。因此，探讨控股股东的身份界定在我国具有现实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第 265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第 15.1 条，控股股东是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超过 50% 的股东，即绝对控股股东；或者持有的股份虽然不足 50%，但其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即相对控股股东。我国法律对控股股东的主体认定采用“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认定标准。形式认定标准即仅以持股比例判断，控股股东需以超过 50% 的绝对持股比例形成对公司的绝对控制。而实质认定标准在实践中则更为常见，即在股东持股比例未超过 50%，但其享有的以表决权为核心的控制权已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将其认定为控股股东。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直接采用实质认定标准，将控股股东定义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股东”。关于实质认定标准，即拥有“控制权”的判断，可以参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修正）》第 84 条：（1）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2）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3）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以上法律及业务规则规定，“控制权”是判断上市公司股东是否属于控股股东的核心，形式上的第一大股东并不必然是控股股东。实践中有的股东以他人代持、间接持股的方式影响、操纵或控制股东大会的决策权，实际上形成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应当将其认定为控股股东。比如母公司对子公司股东大会的决策施加影响，隐瞒股权关系通过空壳公司控股上市公司，非控股股东通过表决权代理等表决权分离的方式对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控股股东并非普通股东，而是对公司实际享有控制权的股东。表面上董事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控股股东没有直接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力，实际上控股股东通过影响董事会实质上取得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于是与公司及其他投资人之间形成一种与董事相类似的信赖关系，需要承担信义义务。为了避免“有权无责，有责无权”的局面出现，《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1）》将控股股东明确规定为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和责任主体，实现证券法律法规从公司治理的法定主体到实际主体的穿透，这不仅是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点的判断，也体现了证券监管机关“精准执法”的制度安排。

二、控股股东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相关主体的责任认定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刑法修正案（十一）》与《证券法》联动修改，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责任，明确其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一）控股股东的信披违法情形

在行政领域，2019年《证券法》修订后控股股东成为常态化的信披义务人，新法增加了控股股东的“组织”行为以及“隐瞒”行为作为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扩大了控股股东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行政责任的范围。而在刑事领域中，2020年发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并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隐瞒的行为明确规定为本罪的实行行为，与《证券法》中信息披露违法的责任主体和违法行为相对应。控股股东的信披违法情形具体包括：

1. 控股股东直接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控股股东通过控制权能够对公司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实际上支配公司重大决策，比如实践中控股股东控制公司印章和信息披露渠道，绕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法定机构，直接以公司名义实施披露虚假信息行为的情形。

2. 控股股东组织、指使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组织、指使”行为本质上是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通过对公司日常事务和重要决策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比如控股股东利用更换董事的权力对董事会施加影响，通过与董监高等经营管理者的关系隐居“幕后”进行控制，利用上下级关系或者附属关系对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做出教唆、授意、威胁、强迫等行为，在具体违法犯罪行为中起到组织、领导、策划、指挥等作用。被组织、指使的对象往往是对信息披露的具体事项有决策权或监督管理权的人，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3. 控股股东隐瞒相关事项导致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隐瞒”行为构成违法的前提是控股股东具有披露某种重要信息的法定义务，这里主要包含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控股股东隐瞒自身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导致公司披露虚假信息，比如控股股东隐瞒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导致公司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对公司股权进行大宗交易买卖、抵押未如实披露交易和抵押信息等等；第二种情形是控股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隐瞒其掌握的足以对公司决策造成重大影响的关键信息，导致公司违规披露或者不披露重要信息，比如控股股东隐瞒关联关系导致控股的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未如实披露。

（二）控股股东的信披违法责任

控股股东组织、指使上市公司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或者故意隐瞒应当披露的信息，导致上市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应当承担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后果。对于控股股东的责任认定，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控股股东没有实际参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没有组织、指使、隐瞒的行为，则无需承担信披违法责任，即使公司构成行政违法或者刑事犯罪，也不应追究控股股东的责任；

（2）控股股东同时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控制权和支配地位实施或者组织、指使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则追究其作为控股股东违反信披义务的法律后果；

（3）控股股东同时兼任公司董监高，利用的是作为董监高的经营管理权而非控制权，则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4）控股股东同时兼任公司董监高，在信披违法行为中同时利用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应当分别就其具体违法行为是基于董监高身份还是控股股东身份作出处罚；[1]

（5）控股股东并未在公司中担任具体职务，通过利用对董事会和公司重大决策的影响力，授意、指挥、主导董监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实施信披违法行为，则追究其作为控股股东违反信披义务的法律后果。

需要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控股股东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新增条款是提示性、注意性规定而非法律拟制，具体责任需要基于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并根据控股股东在犯罪活动中的身份和作用予以认定。《证券法》第 197 条分别针对“控股股东”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信披违法责任规定了不同的罚款幅度，因此，以何种身份承担行政违法责任关系到具体责任认定以及处罚结果。

（三）董监高的信披违法责任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应当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相关信息，并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不得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控股股东组织、指使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案件中，董监高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2]被处罚的情形包括：

（1）董监高是信息披露违法事项的直接主管人员，所涉信披事项在董监高的职责管辖范围内，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董监高接受控股股东的授意、指示实施信披违法行为，则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后果；

(2) 所涉信披事项在董监高的职责范围内，但董监高由于渎职或疏忽大意未发现其中的虚假信息，如在真实性存疑的财务报告上签字，导致公司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此时董监高不具有信披违法的主观故意，但依然要追究其违反勤勉尽责义务的法律責任；

(3) 所涉信披事项不在董监高的职责范围内，董监高的职务行为与信息披露违法事项并无直接关联，且无其他证据证明董监高对信披违法事项知情，此时董监高只有在直接组织或者参与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情况下才需承担法律責任。

对于董监高的責任认定以及責任大小通常需要考虑董监高在具体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发挥的作用、职务職責范围及履職情况、知情程度和参与程度、专业背景等，并结合信息披露违法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认定。

三、董监高在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的减責或免責事由

在控股股东组织、指使实施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中，除了上市公司本身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外，最容易受到責任追究的就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为董监高参与公司内部日常经营管理，行使监督、管理、决策等職能，并负有保证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法定义务。在“影子董事”的影响下，公司管理者之外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往往通过影响和控制真正行使经营管理权的董监高实施信披违法行为，此时董监高虽一定程度上作为“牵线木偶”无法自主决定意志，但由于其违反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也会视其作用和过错大小承担责任。

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董监高信披违法行为的責任认定适用“过错推定”原则[3]，即董监高需要举证证明自己已尽到勤勉尽责义务且不存在过错方可免責。注册制改革后，监管部门对信息披露主体的实质履職要求越来越严格，要求董监高对职务及具体職責范围内的事项实质履行，积极预防、发现和阻止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董监高是否勤勉尽责和实质履職成为监管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核心依据，参考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及司法案例，可以作为董监高减責或免責的申辯事由包括：

(一) 不存在直接参与或知悉违法行为的情形

在江苏保千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庄某策划、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一案中，时任总裁鹿某、时任财务总监、董事何某直接参与或知悉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事项，认定二人为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未披露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周某等 20 人在其任期内的涉及有关定期报告的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确认意见上签字，需承担一定的責任。周某等人主张被庄某蒙蔽，不知情且未参与，现有证据也并未显示周某

等人存在直接参与或知悉违法行为的情形，故认定周某等人为相应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责任人员，处罚相较于鹿某、何某酌减。[4]由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隐瞒行为的隐蔽性，未直接参与和实施信披违法行为的董监高往往难以发现。若所涉信披事项在董监高的职务职责范围内，则董监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仅仅以“不知情”“未参与”“被隐瞒”为由申辩很难被监管机关采纳，因为“不知情、不了解、未参与恰恰是其未勤勉尽责的证明”。

（二）发现舞弊问题后辞职或向监管机构报告

若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在董监高的任期内，即使事后离职也会追究对信披违法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如果董监高确未参与信披违法行为，发现公司存在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后辞职或向监管机构报告，可以作为酌情考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依据。昆明机床财务造假一案中，张某等 24 名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存在虚假记载的年度报告上签字，应对昆明机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一定责任。其中，时任独立董事并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杨某曾对审计机构提出质询，但其专业背景和职务范围本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却未能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履行职责，预防、发现和阻止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未达到勤勉尽责的要求。杨某在获悉昆明机床存在财务舞弊问题后即辞职并向监管机构报告，可作为从轻情节予以考虑，对其适当减少罚款金额。[5]

（三）在年度报告中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定期报告上签字的董监高通常会被认定为对该报告所涉信披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就要求董监高不能仅仅以“签字”的形式履职为由主张勤勉尽责，而要对报告中披露的信息进行实质审查。在紫晶存储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中，时任董事温某、王某对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签字确认，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一定责任。在违规事项披露前，温某、王某分别采取了针对性问询、提请会计师关注相关事项、提议召开董事会等会议、督促公司回函并自查整改等履职措施。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或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审议中，温某、王某投弃权票或反对票，将无法保证相关定期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况予以明示，向市场及投资者揭示了一定风险。监管机关对温某、王某予以监管警示，未给予行政处罚。[6]

（四）积极采取措施纠正错误行为

董监高如果发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公司其他人员实施了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且损害结果已经发生，积极采取措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挽回损失、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也可以作为证明董监高积极作为且主观过错较小的理由。永安林业信息披露违法一案中，时任董

事长吴某虽未知悉、参与并实施信披违法行为，但其未能及时发现和阻止永安林业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未能勤勉尽责，系对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考虑到其在发现财务造假后，主动报告造假行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对其处罚予以酌减。[7]暴风集团信息披露违法一案中，时任独立董事张某、罗某未对定期报告的披露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但考虑到暴风集团风险爆发后张某、罗某仍坚守岗位进行履职，为体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及人文关怀，对张某、罗某酌定减轻处罚。[8]董监高采取措施纠正错误行为可以作为减责事由，若要真正实现免责则需达到有效阻止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的程度。

四、董监高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合规路径

1. 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内部信息披露制度

通过规范化的制度体系明确董监高履职的权限和范围，对董监高履职的权利行使给予充分的授权和支持，保障董监高能够充分全面核实签字确认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在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对公司经营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要确保有信息透明的渠道，避免出现董监高履职受到阻碍、无法了解到真实信息的情况。

2. 强化对董监高实质履职的制度性保障

董监高需要对签字确认的公司法律文件承担全面性责任，要以对签字确认事项的实质审查代替仅仅“签字”的形式审查。董监高可以要求上市公司给予其合理的审查时间，并就相关文件提供全面的基础材料。当文件涉及法律、财务会计等专业知识时，董监高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查，以证明其实质履职且尽到了注意义务。

3. 对公司反常现象予以充分关注

董监高需要在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定期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合规情况进行督察，尤其是对自己职务及具体职责范围内的业务应当有更为敏感的判断。其中，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较为高发的财务造假、关联交易、违规担保等相关情况应保持高度关注，必要时可以借助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发现问题后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整改。

4. 及时提出异议并保存记录

对于公司的年度报告、定期报告、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等重要文件，董监高在签字时应保持谨慎，对于一般事项需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对于自己职务职责范围内或专业领域的事项应更加审慎，对相关事项进行实质审查。如果发现文件存在问题或者真实性存疑，董

监高应及时提出异议并予以书面记录。

5. 履职过程中的证据留痕保存

董监高的勤勉尽责义务是一种积极作为的义务，在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中需勤勉尽责，积极发现、预防、阻止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及时揭露并纠正违法事实。在董监高履职的过程中，应积极提出质询、异议，并将质询、异议以及向中介机构咨询的证据完整保存。

6. 积极采取措施挽回损失

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已经发生后，董监高依然可以积极履行职责，督促公司整改，尽力挽回损失，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如果相关责任人员拒不整改，董监高应及时向公司和证券监管部门举报，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积极行使申辩的权利，避免承担本不应承担的行政处罚责任、刑事处罚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五、结语

信息披露制度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有助于投资者作出理性决策，促进资本市场领域资源的优化配置。近日，证监会明确表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强化立体化追责和穿透式监管，进一步深化重大案件行刑衔接，坚持追“首恶”与打“帮凶”并举，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生态。在《证券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联动修改之下，控股股东作为“关键少数”成为行政监管和刑事打击的关注焦点。在控股股东组织、指使实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应保持独立履职，切实履行对投资人的忠实义务和对公司的勤勉尽责义务，积极采取措施及时发现、预防和阻止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避免成为资本的“帮凶”而受到追责。

注释：

[1] 行政处罚中若控股股东分别利用其作为控股股东和董监高的权利，同时违反了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和董监高的勤勉尽责义务，则分别针对其不同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此时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的原则；而在刑事犯罪中对同一主体的同一违法事实不会重复评价，原因在于违法行为只侵犯了一个法益。

[2]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通常是指依据法律法规对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负有保证义务的董监高，但其能够证明已尽忠实、勤勉义务，没有过错的除外。对于董监高之外的其他人员，确有证据证明其行为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包括实际承担或者履行董监高的职责，组织、参与、实施了公司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或者直接导致信息披露违法的，应当视情形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3]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十五条：发生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对负有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义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视情形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但其能够证明已尽忠实、勤勉义务，没有过错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张对虚假陈述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工作岗位和职责、在信息披露资料的形成和发布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取得和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为核验相关信息所采取的措施等实际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前款所列人员不能提供勤勉尽责的相应证据，仅以其不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无相关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和、相信发行人或者管理层提供的资料、相信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理由主张其没有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141号。

[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9号。

[6]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20号。

[7]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3号。

[8]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号。

聚焦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犯罪（一）——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摘要：鉴于财务造假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动摇投资者信心，近年来，监管机关持续加大对财务造假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从严打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为加强对财务造假违法犯罪案件的审判指导，2024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五个财务造假典型案例，落实对财务造假“零容忍”的要求。2024年8月16日，最高检印发《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明确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的总体要求、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重点问题。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和违规披露往往是“一条龙”犯罪行为，本文结合《解答》和财务造假犯罪典型案例，深度解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定罪量刑标准、免予处罚情形以及罪数等问题，旨在为涉上市公司证券犯罪案件的适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证券犯罪；信息披露；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纲目

一、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范围

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行为方式

- （一）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 （二）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
- （三）信息披露“重大性”的判断标准

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情节

- （一）严重损害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入利益之数额标准
- （二）其他严重情节之比例标准
- （三）其他严重情节之其他情形

四、信息披露违法免予刑事处罚和无罪的情形

- （一）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 （二）未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入利益

五、关于罪数问题

（一）欺诈发行证券罪

（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三）合同诈骗、虚开发票、逃税等犯罪

六、结语

一、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范围

2023 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我国资本市场进入全面注册制时代。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要求发行人公开发行动券时依法披露重要信息，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持续信息披露阶段要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得存在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作为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进行重大修改，保障信息披露制度有效实施，体现依法严厉打击信息披露过程中的欺诈发行、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司法政策导向。

《解答》指出，准确认定公司、企业是否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及其披露义务是认定本罪的前提条件，对此应当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根据上述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作出判断。《刑法》第 161 条第 1 款规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主体为“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为了与《公司法》《证券法》等前置法相衔接，刑事司法中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范围应与行政执法保持一致。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1）》，信息披露义务人，是指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重大交易有关各方等自然人、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破产管理人及其成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比如《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其他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1]

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行为方式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是指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入利益的行为。

（一）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财务造假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的重点多发领域，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制作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健全公司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真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不仅是公司依法纳税的依据，能够使国家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而且是股东和社会公众了解公司实际经营效益最直接的途径，能够引导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如果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掩盖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粉饰公司经营业绩，不仅会损害股东和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会扰乱资本市场秩序。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会年会的二十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所谓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是指在财务会计报告中虚构不存在的事实或者隐瞒应该如实反映的重要事实。实践中经常表现为虚构公司经营情况，如未如实披露公司的盈利或亏损情况；对某些重要事实做虚假陈述，如重大债权债务不披露；故意遗漏重要事项或大笔资金的去向情况，以此欺骗股东和社会公众，损害股东及投资人、债权人的利益。

（二）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

“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的具体范围，应当依照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务院证券管理机构的有关要求作出认定。“不按照规定披露”，是指对除财务会计报告以外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披露或者进行虚假披露，如在信息披露中故意有虚假记载、重大遗漏、误导性陈述等内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包括在依法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以及发售基金份额时依法应当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等，在证券、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前依法应当公告的上市公告书及有关信息，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等，以及证券、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后依法应当持续披露的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依法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2]

（三）信息披露“重大性”的判断标准

对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中的隐瞒“重要”事实、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都涉及对信息披露“重大性”的判断。笔者总结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主流观点，有学者从证券定价的角度，认为“重要事项”应当指发行上市后基于持续信息披露义务要求而应当向市场公开的对公司证券定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3]；有学者从投资者决策角度，认为“重要信息”应当是与投资者作出投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4]。“新二元论”将价格敏感测试作为判断信息重大性时优先适用的规则性规范，将投资者决策测试作为信息呈现价

格弱敏感或因缺少数据导致价格敏感测试无法适用时的原则性规范。[5]

综合以上观点，当《证券法》中列举的“重大事件”不能完全涵盖实践中的重要信息时，判断信息是否具有“重大性”从而公司应当予以披露的标准，可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1）该信息是否会对资产价值、证券价格、投资交易价格产生显著影响；（2）该信息是否是投资者做出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披露该信息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

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情节

《解答》指出，《立案追诉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规定的定罪量刑情节大致可以分为数额、比例及其他情形三种，下文将结合典型案例，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以及定罪量刑情节进行解读。

（一）严重损害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入利益之数额标准

《标准》第6条规定，造成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入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此规定可以理解为《刑法》第161条规定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入利益”的数额标准。对于“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解答》明确相关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已有生效判决的，可以参照民事判决对直接经济损失作出认定；直接经济损失数额难以准确计算的，应当依法委托专门机构出具测算报告后予以审查认定。据此，刑事领域中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可以进行有效衔接，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投资者损失数额的计算均可以参照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二）其他严重情节之比例标准

《标准》对《刑法》第161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进一步细化，具体可以细分为比例标准和情节标准。关于适用比例标准的情形，包括虚增或者虚减资产、虚增或者虚减营业收入、虚增或者虚减利润、未按照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或者其他重大事项，并根据不同的情形适用不同比例。

（1）虚增或者虚减资产达到当期披露的资产总额30%以上

ST博元案：博元公司利用1亿元借款，通过循环转账，虚构已由华某公司支付384,528,450元股改业绩承诺款的事实，并由博元公司在履行股改业绩承诺款的公告、2011年半年报及年报中进行披露，虚增资产达到当期披露资产总额的30%以上。2012—2014年期间，被告人余某某多次虚构将虚假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票据置换和支付预付款等交易，并根据相关置换来的虚假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记账，制作博元公司的虚假财务报表、致使博元公司披露的

2012 年至 2014 年的半年报、年报中虚增资产金额达到了当期披露的资产总额的 30%以上。[6]

(2) 虚增或者虚减营业收入达到当期披露的营业收入总额 30%以上

中毅达案：上海中毅达为虚增业绩，由时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任某某决定将上述项目中已由其他企业完工的约 80%工程收入违规计入公司三季度，具体由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林某 2、公司财务经理秦某某、厦门中毅达副总经理盛某实施。盛某安排厦门中毅达提供虚假的工程、财务数据，秦某某依据上述数据编制上海中毅达三季度财务报表，交林某 2 签字确认。2015 年 10 月 28 日，上海中毅达将该三季度财务报表对外披露。经鉴定，上海中毅达共虚增主营收入人民币 72,670,000.00 元，占同期披露主营收入总额的 50.24%。[7]

(3) 虚增或者虚减利润达到当期披露的利润总额 30%以上

獐子岛案：2016 年，为避免公司因连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被告人吴某某指使公司人员调减虾夷扇贝采捕面积以虚减营业成本，对部分海域已经不存在的扇贝应作核销处理而不作核销处理，虚减营业外支出。獐子岛公司公开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 1.3 亿余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58.11%。2017 年末至 2018 年初，吴某某指使公司人员在隐瞒海域增设抽测点位、编造扇贝死亡的虚假消息，对已采捕海域的扇贝虚假核销、减值，相关人员还虚增捕捞面积和营业成本，以核销 2016 年度的虚增利润。獐子岛公司公开披露的《2017 年年度报告》虚减利润 2.78 亿余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38.57%。[8]

(4) 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或者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达到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 50%以上

江苏琼花案：2006 年 11 月至 2008 年 11 月间，被告人于某某使用江苏琼花公章，以江苏琼花的名义，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控股股东琼花集团等关联方提供担保 24 笔，金额计人民币 16035 万元，占江苏琼花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101.29%。其中 2007 年 1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0 月 31 日连续 12 个月的担保累计数额为人民币 12005 万元，占江苏琼花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75.83%。江苏琼花对上述担保事项未按规定履行临时公告披露义务，也未在 2006 年报、2007 年报、2008 年半年报中进行披露。[9]《解答》特别指出，由于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对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负有临时报告、定期报告的双重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对于临时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定期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应当分别计算，其中一个比例达到该项标准的就应当立案追诉。

(三) 其他严重情节之其他情形

《标准》对《刑法》第 161 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还规定了“其他情形”，包括：

(1) 致使不符合发行条件的公司、企业骗取发行核准或者注册并且上市交易的；(2) 致使公司、企业发行的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存托凭证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易的；(3) 在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中将亏损披露为盈利，或者将盈利披露为亏损的；(4) 多次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多次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的。此外还规定了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入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标准》中规定的数额标准、比例标准以及情节标准不仅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也是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标准。《解答》明确，上述的多项标准是并列适用的关系，在适用上有准确选择的要求，但没有优先、劣后之分，达到其中一项标准的就应予立案追诉。兜底条款在适用上虽应慎重把握，但与同条款的其他规定仍属并列适用关系。《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罪名新增了一档法定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将本罪的最高刑期从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了十年有期徒刑。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解答》明确关于数额标准可按司法实践通行的五倍关系把握刑罚升档标准，关于比例标准和其他情形的升档标准则可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结合常情常理进行把握，有待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案情做出探索。

四、信息披露违法免于刑事处罚和无罪的情形

（一）犯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

北京市首例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韩某某、陶某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华锐风电公司作为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上市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入利益，韩某某、陶某分别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应予惩处。但是，鉴于本案犯罪事实系华锐风电公司自查发现并主动上报监管机关，韩某某、陶某已缴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虚假信息披露行为对二人所处的罚款，陶某具有从犯、自首的法定情节。陶某在华锐风电公司被证监会调查后，配合监管部门的风险处置工作，起到了稳定公司经营秩序、协调解决债务纠纷的作用，得到了证监会北京监管局的认可。因此，可以认为陶某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故判决对陶某依法免于刑事处罚。[10]

（二）未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入利益

顾某某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重要信息再审案件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顾某某为了夸大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经营业绩，以加大亏损额、压货销售、本年费用延后入账、

作假废料销售等方式虚增利润，向社会提供含有虚增利润的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剥夺了社会公众和股东对上市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知情权，对社会作出了错误的诱导，给股东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行为已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定，科龙电器在 2002 年至 2004 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已经达到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入利益的程度，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证据裁判原则，依法不应追究顾某某等人的刑事责任，对顾某某等人应按无罪处理。[11]

五、关于罪数问题

（一）欺诈发行证券罪

关于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数问题，《解答》指出，公司、企业利用相同的虚假财务数据，先后实施欺诈发行证券行为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属于实施了两个违法行为，分别构成犯罪的，应当同时以欺诈发行证券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上市公司在申请上市前后连续实施财务造假行为，在发行上市阶段和持续经营阶段涉财务造假的信息披露行为分别侵犯了国家股票发行管理制度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应当分别认定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先后参与上市前后的财务造假行为，应予以数罪并罚。

（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实施财务造假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入利益的，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同时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例如利用职务便利以上市公司名义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且未披露违规担保情况，同时损害了股东、投资人利益和上市公司的利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信息披露违法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应当按照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数罪并罚。

（三）合同诈骗、虚开发票、逃税等犯罪

《解答》指出，单位或个人通过签订虚假交易合同、资金空转等手段，配合公司、企业实施财务造假行为，构成合同诈骗、虚开发票、逃税等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成立财务造假犯罪共犯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六、结语

2024年2月4日，最高检厅长在网络访谈中表示，投资者保护是办理证券案件的重中之重，依法严厉查处证券违法犯罪案件，坚持“严”的主基调，依法从严、全链条追诉财务造假犯罪案件。财务会计报告是投资者判断公司质量、持续经营能力、投资价值最为重要的基石信息，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财务造假手段不依法披露亏损或者其他不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的财务信息，将会严重侵害股东及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和投资者的信赖利益。为了从严打击编造或者隐瞒重大财务信息的财务造假行为，强化刑事、行政、民事立体化追责，《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保障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有效实施，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合法利益。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2015修正）》第七十四条：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其他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依法披露基金信息，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第七十五条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确保应予披露的基金信息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时间内披露，并保证投资人能够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

[2] 参见陈志军：《立足客观特征与主体范围，准确处理涉信息披露犯罪》，载《检察日报》2021年12月31日。

[3] 参见谢杰：《全面注册制背景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犯罪的实践解构》，载《清华法学》2023年第3期。

[4] 参见田宏杰：《行刑共治下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立法变迁与司法适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2期。

[5] 参见徐文鸣、刘圣琦：《新〈证券法〉视域下信息披露“重大性”标准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2020年第9期。

[6] 参见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4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书。

[7] 参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3刑初4号刑事判决书。

[8] 参见《2023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9] 参见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2）扬邗刑初字第0005号刑事判决书。

[10]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刑终88号刑事判决书。

[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刑再4号刑事判决书。

让“吹哨人”敢于吹哨：关于内部举报人保护机制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举报人保护的重要性在企业界得到了广泛关注。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内部人员可能出于利益考量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会给企业造成损失，而且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同时，由于这些行为一般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外部难以及时发现。在此情形下，举报人对于组织内部不当行为、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的揭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举报行为往往伴随着重大风险，包括报复、失业和个人困境。为了鼓励员工勇于揭发不当行为，培养透明和问责的文化，企业有必要建立健全的内部举报人保护体系。本文拟探讨在组织内部构建有效的举报人保护框架所涉及的关键要素和考虑因素，并提供实用的操作指南和建议。关键词：内部举报；合规制度；举报人保护 纲 目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我国企业内部举报保护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规范对内部举报人保护的规定尚不完善

（二）企业内部存在诸多妨碍举报的因素

三、企业内部举报人保护体系的构建建议

（一）将举报人保护纳入企业合规管理体系

（二）明确举报的渠道和程序

（三）建立信息保密和数据保护制度

（四）制定反报复措施

（五）完善调查和补救程序

（六）开展培训，提升意识

（七）持续改进和监控

四、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内部举报人，又被称作“吹哨人”。19世纪，英国警察在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时会进行吹哨，一方面是对行为人进行警告，另一方面能够引起其他警察以及公众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吹哨人”这个概念逐渐指代那些为了引起关注而揭示不法行为的人。在企业内部，

“吹哨人”往往最易发现企业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不当行为被揭露得越早，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也越小。同时，随着我国合规理念的发展，企业内部举报已成为了衡量公司内部合规制度完整性和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因此，企业往往会设立内部举报制度，意在鼓励内部员工积极向企业进行举报。诚然，理想化模式下的企业内部举报制度可使企业及时了解自身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合规问题，并能迅速进行展开调查、应对，避免在未来面临“失控”的被动局面。但是实践中，各种妨碍内部举报人进行举报的因素使得企业内部举报制度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是什么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内部举报制度有效运行？如何通过配套制度的构建使其发挥作用？本文将从法律现状、现实困境、实践路径等维度，对这一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建议。

二、我国企业内部举报保护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规范对内部举报人保护的规定尚不完善

如前所述，企业内部举报是评价公司内部合规制度完整性和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为帮助企业建立合规体系，我国各部门围绕着企业合规出台了一系列指引和规范性文件，其中不乏关于企业内部举报制度的内容。

2008年5月，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印发《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号），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和举报人保护制度，设置举报专线，明确举报投诉处理程序、办理时限和办结要求，确保举报、投诉成为企业有效掌握信息的重要途径。举报投诉制度和举报人保护制度应当及时传达至全体员工。”该条是国内最早针对举报人保护制度的规定，意在指引企业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激励企业员工勇于提出举报。

2018年11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强化违规问责，完善违规行为处罚机制，明晰违规责任范围，细化惩处标准。畅通举报渠道，针对反映的问题和线索，及时开展调查，严肃追究违规人员责任。”该条强调了企业内部建立举报渠道的重要性，也再一次证明了内部举报制度在企业整个合规制度框架下具有重要的地位。

2018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印发《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该指引第二十条规定：“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合规信息举报体系。员工、客户和第三方均有权进行举报和投诉，企业应充分保护举报人。”该条

规定涉及到的举报人保护，既包括对内部举报人的保护，也包括对诸如客户、第三方等外部举报人的保护。

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

客观而言，上述文件中均提及了企业内部举报人保护制度，但我们依然认为，现行法律规范对内部举报人保护的规定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这些规定分散在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中，立法未作出体系性规定，导致条款内容多有重复；其次，这些条款所属的文件效力层级较低，多以“指引”“意见”的形式呈现，法律、法规、规章层面还未见相关规定；再次，这些条款多为宣示性条款，在性质上属于非规范性条款，难以在企业内部举报人保护问题上发挥实质作用，难以直接指导实践。在缺乏硬性约束的情况下，建立健全内部举报人保护体系，主要依赖企业的自觉和自律，推进的进度和力度不尽如人意。

（二）企业内部存在诸多妨碍举报的因素

在法律保障和外部监管不足的背景下，企业员工提出举报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在企业尚未建立恰当的内部举报人保护制度，当“举报”成为一项“高风险”活动，又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或不敢提出内部举报，这些因素妨碍了举报人积极提出内部举报，成为目前许多企业内部举报制度失灵的原因。对此，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当面对可能危及切身利益的选择，您会愿意挺身而出进行“举报”吗？因此，在讨论企业如何建立有效的内部举报制度时，必须先对员工“举报”前可能产生顾虑的因素进行分析、总结。

1. 来自企业内部人员的“报复”

员工在公司中发现违规行为时，通常会选择向公司合规部门进行举报，但若举报人信息被泄露，他们可能会遭受包括上级在内的公司内部人员的报复，包括晋升受阻甚至被解雇。因此，如果员工对企业内部举报人保密措施心存担忧，害怕遭受报复，员工多数情况会选择保全自己，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

2. 自身可能面临的诬告风险

如果员工所举报的内容在经过调查后被认为不能成立，其可能面临来自被举报人的投诉。在此情况下，不排除举报人会因举报不实而受到所任职企业的内部处理，尤其是当被举报人与举报人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时，举报人自身可能面临诬告风险也成为了举报人积极提出内部举报的障碍。

3. 过高的内部举报门槛

实践中，过高的举报门槛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诸多内部举报也会因此被拒之于门外。部分企业为避免“错告”“滥告”，对举报事项真实性提出了严苛要求。这无形中加重了举报人的责任和风险。员工担心一旦举报不实，不仅名誉受损，甚至会遭受处分，这极大地挫伤了举报的积极性。

4. 职场文化对举报人的排斥

封闭保守的职场文化无形中抑制了举报行为。许多企业仍然受到“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影响，对举报者有本能的抵触。在这种环境下，举报者常常被污名化，得不到组织的理解和支持，处境堪称进退两难。

三、企业内部举报人保护体系的构建建议

（一）将举报人保护纳入企业合规管理体系

1. 将举报人保护作为合规管理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举报人保护的法律法规，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忽视举报人保护。恰恰相反，在当前国内合规要求日益严格的大背景下，企业更应将举报人保护作为合规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企业的整体合规政策和管理体系之中。这不仅有助于企业及时发现和化解合规风险，更能向员工和社会公众传递企业“重视合规、尊重举报”的积极信号。

2.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土实际在构建举报人保护机制时，企业应积极学习借鉴国际相关立法和实践经验。如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和欧盟的《欧盟举报人保护指令》等，这些都为企业举报人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保护措施。同时，企业还应充分考虑本土法律环境和文化特点，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和组织结构，探索切实可行、务实有效的保护途径。

3. 将举报人保护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契机企业在推进举报人保护工作时，应将其视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员工责任意识的重要契机。通过宣传举报人保护制度，强化全员合规理念，营造“人人享有举报权利，人人也有举报责任”的文化氛围，鼓励员工积极主动参与企业合规工作。同时，企业也要加强对管理者的教育培训，提高其大局观念和 risk 意识，带头支持和配合举报人保护工作，以上行下效、全员参与的方式，将举报人保护深深融入企业文化之中。

（二）明确举报的渠道和程序

1. 建立多元化的举报渠道有效的举报人保护体系必须为员工提供明确、便捷、多元化的举报渠道。除了传统的热线电话、专用邮箱等，企业还应当积极拓展新的举报方式，如在线举报平台、移动 APP 等，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员工举报提供更多选择。同时，对于跨国企业而言，举报渠道还应当支持多语种服务。

2. 制定清晰的举报程序和指引建立举报渠道的同时，企业还需要制定清晰、规范的举报程序和指引，包括明确举报的范围和标准、提交举报的方式和要求、举报人需要提供的信息、举报后的流程等。相关程序和指引应当以书面形式固化下来，采取员工易于理解和掌握的语言，确保举报政策“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3. 鼓励并保障匿名举报匿名举报是鼓励员工勇于举报的有效手段。企业应当在举报渠道和程序中明确允许并支持匿名举报，并通过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切实保障举报人的“匿名权”。与此同时，企业也要合理设置匿名举报的边界，在保护举报人权益与调查取证的需要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匿名举报被滥用。

（三）建立信息保密和数据保护制度

1. 明确保密原则和措施保密是举报人保护的关键。

企业必须明确保密原则，承诺对举报人身份和举报内容严格保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保密措施，包括在举报渠道、调查过程、内部沟通等各个环节中贯彻保密要求，严格限制知情人的范围，防止举报信息泄露和扩散。

2. 建立健全的数据安全机制在数字时代，保密离不开数据安全。

企业需要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机制，利用必要的技术手段，如数据加密、访问控制、日志审计等，对涉及举报人个人信息和数据进行全面保护，提高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防范数据泄露和网络攻击等安全风险。

3. 明确信息共享和披露的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如调查取证或法律要求，可能需要有限披露举报人信息。

对此，企业应当明确信息共享和披露的规则和程序，确保在合法合规、确有必要的前提下披露相关信息，并向举报人告知相关情况，提供必要的说明和保障，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举报人权益的影响。

（四）制定反报复措施

1. 明确禁止报复的政策企业必须明确禁止对举报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反报复政策应当以正式文件予以发布，明确报复行为的定义及表现形式，严禁对“善意”举报人进行解雇、降职、减薪、骚扰、歧视等不利行为，确定违反禁止报复政策的处理措施和惩戒机制。

2. 建立有效的监测和预警机制为及时发现和制止报复行为，企业需要建立有效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指定专门人员或部门负责监测和接收报复投诉，设立举报人保护专线，定期对举报人进行回访，主动关注举报人的工作状态和个人境遇，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潜在的报复风险信号并采取应对措施。

3. 为遭受报复的举报人提供救济如果举报人遭受报复，企业应当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为其提供必要的救济和保护，包括制止报复行为，消除不利影响，对报复行为人予以严肃处理，必要时还需提供法律援助，协助举报人维护合法权益。同时，企业还应建立举报人关爱机制，从心理疏导、能力提升、职业发展等方面对举报人予以支持和帮助。

（五）完善调查和补救程序

1. 建立专业的调查团队和机制高效、专业的调查是举报人保护的重要保障。企业需要建立专门的调查团队和机制，配备具有专业技能和经验的调查人员，制定规范的调查程序。调查过程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程序正当，全面收集证据，并充分听取举报人的意见和诉求。

2. 举一反三，系统治理举报人保护制度不是“单兵作战”，而是需要与其他一系列机制协同发力，包括内部控制、道德规范及公司治理等。只有将这些制度有机融合、形成合力，举报人保护制度的效能才能最大化。因此，企业在设计举报人保护制度时，要放在制度体系全局中审视其匹配性和关联性。

3. 加强调查结果的运用和反馈应当得到有效运用调查结果，切实落实整改措施，并向举报人反馈调查和整改情况。这不仅有助于保障举报人的知情权，也能提升举报人的信任感及参与度，让举报人真切地感受到自身行为带来的改变和影响，从而更加坚定地成为维护公司利益的“安全阀”。

（六）开展培训、提升意识

1. 加强全员培训和宣传企业应当将举报人保护纳入全员合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入职培训、在职培训、专项培训等多种形式，向全体员工普及举报人保护的 policy 要求、程序标准、行为规范等，提高员工的政策意识和规则意识，营造“人人可举报、人人应举报”的文化氛围。

2. 开展重点培训，强化关键群体的责任意识对管理层、合规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关键群体，应当开展有针对性的重点培训，帮助其全面了解举报人保护的内涵要求，准确把握各部门在举报人保护中的职责定位，切实履行保护举报人、调查举报事项、整改违规违法问题等方面的管理责任，成为举报人保护的模范践行者。

3. 创新宣传方式，营造鼓励举报的文化氛围企业应当创新宣传方式，综合运用案例教育、

情景模拟、互动讨论等多种培训手段，提高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同时，可以充分利用海报、视频、微信公众号、内部刊物等多种宣传载体，广泛宣传举报人保护政策，强化举报人保护意识，努力营造积极、正面、鼓励举报的文化氛围。

（七）持续改进和监控

1. 持续评估政策和机制的有效性举报人保护体系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系统工程，需要持续评估政策和机制的有效性。企业应当建立政策评估和绩效考核机制，定期审视举报人保护各项制度和措施的落实情况，评估政策执行的效果和影响，并结合评估结果持续优化和改进。

2. 加强对举报事项的分析研判企业应当加强对举报事项的分析研判，定期梳理汇总举报的类型、特点、趋势等，深入剖析问题的成因、规律、影响，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措施。举报分析应当成为企业风险管理和内控建设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决策依据。

3. 建立举报人保护的外部协同机制举报人保护不是企业内部的“独角戏”，还需要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建立必要的协同机制。企业应当加强与执法机关、行业组织、专业机构等的沟通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争取外部支持，共同营造良好的举报人保护生态。必要时，还可引入第三方评估，以更加客观、专业的视角审视企业举报人保护体系的成熟度和有效性。

四、结语

建立完善的内部举报人保护体系，是现代企业不可或缺的治理机制和责任担当，对于提升企业合规管理水平，培育清朗透明的企业文化，塑造廉洁自律的从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企业应当将举报人保护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以制度为基础，以技术为支撑，以文化为引领，以人本关怀为底色，不断提升举报人保护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常态化水平，以良好的举报人保护生态激发员工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在当前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受到重视、ESG 理念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举报人保护已经成为衡量企业道德操守、诚信品格的重要标尺。对于负责任、有担当的企业而言，建立健全举报人保护体系，不仅仅是合规底线，更是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企业未来发展负责的承诺，是走向卓越、基业长青的必由之路。

上海律协企业合规专业委员会

主 任:

杨伟东 (上海格联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

李嘉杰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吴 璘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赵何璇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委 员:

陈 兵 陈 敏 仇如愚 陈松竹 丁 亮 董 野 丁志龙 冯 欣 顾丽萍 郭青红 高睿静
葛 舒 葛文昱 胡文兵 胡晓光 江秋杰 蒋 霞 孔 丽 李 擘 刘 畅 陆春晨 刘宏悦 吕
晋 李 响 李心军 刘秀丽 林 媛 乔 骄 全开明 钱 莉 盛琬刚 史昭君 田 原 王东升
万海军 王黎君 王 森 王 璇 谢凌云 谢佩之 薛雯雯 邢芝凡 殷慧娟 袁开宇 杨利涛 尹
庆 杨 薇 杨晓蓉 张 斌 张 涵 周 航 赵海英 赵嘉炜 张善奋 朱永红

秘书: 王英卜